

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文学思潮

Indonesian Literary Thoughts in the Post-Suharto Era

周启宇^{*}

(ZHOU Qi Yu)

摘要

1998年印尼威权政治解体后文学呈现多样化发展势头。先有以阿尤·乌塔米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纷纷以文学为武器表达女性呼声，接着华人题材的小说、伊斯兰爱情故事、印度洋海啸的灾难叙事与言说教育困境的畅销书接连问世，新时期小说改编为电影亦成为印尼文艺界的时尚，文学奖项也成为反映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立足于改革前后的历史与现实，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文学思潮应当从解构威权话语、突破固有藩篱和对话西方想象三个层面进行观照。

关键词：后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文学思潮、西方想象

Abstract

Since the collapse of Indonesia's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1998,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has gained momentum. Initially, female writers heralded by Ayu Utami wielded literature as a weapon to voice women's ideas. Afterwards, various works began to sprung up, such as novels with ethnic Chinese themes, Islamic romances written by moderate Muslims, narratives of the Indian Ocean Tsunami, and best-selling books on educational dilemma. The adaptation of novels of the Reform Era into movies has also become a fashion. In the meantime, literary awards have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literary thoughts. Given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before and after 1998, the Indonesian literary trend in the post-Suharto era should be viewed through three perspectives: the deconstruction of authoritarian discourses, breaking through established social barriers, and discourses with Western imagination.

Keywords: The Post-Suharto Era, Indonesia, Literary Evolution, western imagination

一、前言

1998年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爆发反对苏哈托政权的民主运动，执政长达32年的苏哈托总统在一片呼声中被迫下台。随后开启的民主转型进程催生印尼政治体

^{*} 周启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非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zhou-qiyu@qq.com

制、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革，曾在苏哈托时代备受压抑的女性群体走上政治前台，提出要求维护妇女权益的种种诉求（范若兰，2017）。女性主体意识的高歌猛进必然会映射在刚刚摆脱苏哈托文化高压政策的印尼文坛：1998年印尼女作家阿尤·乌塔米（Ayu Utami，1968—）在苏哈托下台前十日推出首部小说《萨曼》（*Saman*，1998），她对禁忌话题的触碰开启新时期女性写作的风潮，一时间女性作家作品纷纷登场甚至形成所谓的“芬芳文学”（*Sastra Wangi*）（参见周启宇〈印尼女作家阿尤·乌塔米笔下的历史与现实〉）。

受到改革浪潮的巨大鼓舞，印尼文艺界迎来多样化发展势头：反映20世纪华人参与印尼国家构建历程的小说《名媛》（*Ca Bau Kan*，1999）在2002年被翻拍为电影后甚至远赴美国棕榈泉电影节上映（Anto Sutandio，2014）；而后《爱的诗篇》（*Ayat-ayat Cinta*，2004）演绎现代伊斯兰爱情故事引发宗教狂热，一时间伊斯兰背景下的“罗曼”小说争相涌向出版市场，而《爱的诗篇》同名电影也在2008年引爆海岛东南亚国家的票房（Mohd. Zariat Abdul Rani，2012）；讲述贫穷学校诞生天才少年的小说《天虹战队》（*Laskar Pelangi*，2005）于2008年改编为同名电影，电影的大受欢迎甚至促进了勿里洞地区的旅游业（唐慧 2015：324）。此时小说改编电影已成为印尼文艺界的时尚，文学与电影呈现比翼双飞的局面。

苏哈托时代受压抑的群体在1998年以后纷纷寻找突破口表达声音，以此为背景考察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文学思潮，可以认为其多样化发展道路与改革时代政治环境的巨变及其促成的相对宽松的文艺氛围不无关联，因此研究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文学思潮不能脱离其诞生的社会环境。纵观国内外学界目前罕见对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文学思潮的系统性研究——澳大利亚教授哈利·阿夫琳（Harry Aveling）和帕梅拉·艾伦（Pamela Allen）等人较早地对“芬芳文学”现象进行阐释，芭芭拉·哈特里（Babara Hatley）在论文中阐释小说《萨曼》引发的文学现象，周启宇此前发表的〈印尼女作家阿尤·乌塔米笔下的历史与现实〉一文仅涉及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阿尤·乌塔米一人——因此，系统梳理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文学思潮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解构威权话语、突破固有藩篱和对话西方想象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二、解构威权话语顺应改革潮流

1994年包括《时代》（*Tempo*）在内的三家印尼新闻杂志被苏哈托政权查封，新闻界便有了新闻自由的诉求，曾在苏哈托统治的“新秩序”时期担任记者的阿尤·乌塔米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她因不满政府当局的新闻压迫政策而在“新闻被封禁，文学应发声”的号召下于1998年推出小说《萨曼》，小说诞生于苏哈托下台前十日且含有抨击时政、叩问宗教正统与张扬女性权利等内容，因此被誉为象征民主与改革的里程碑（参见周启宇《印尼女作家阿尤·乌塔米小说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小说《萨曼》既有改革的象征意义又顺应改革的历史潮流，此后解构威权话语似乎在苏哈托下台后的几年内成为印尼文学的重要旨归。

《时代》周刊由印尼著名文学家古纳万·默哈迈德（Goenawan Mohamad, 1941—）于1971年模仿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创立，西方叙事话语在其中欲盖弥彰。古纳万早年留学美国哈佛，曾在20世纪60年代积极支持《文化宣言》（Manifesto Kebudayaan）¹，以普遍性文艺反对政治性和阶级性文艺（梁立基 2014：384）。1994年《时代》周刊因大量发表批判苏哈托政权压迫民主的文章遭到查封。²基于对印尼文艺界的长期耕耘，古纳万的文化思想有着深远影响，他于2001年出版的文集《当革命不复存在之后》（*Setelah Revolusi Tak Ada Lagi*, 2001）探讨包括普拉姆迪亚（Pramoedya Ananta Toer, 1925-2006）³在内的数十位印尼文学家、思想家的思想内涵，同时与一批西方现当代思想家对话：德里达⁴、加缪、尼采、萨特和卡尔·马克思等人都在其列。这部文集是古纳万33年的思想结晶，他思辨的文化思想反映出印尼文艺界对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刻关怀。

2001年11月，印尼自1998年以来第三次修改宪法，谋求模仿西方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许利平，2011）。但此时结束32年威权政治的印尼社会面对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似乎有些迷茫，甚至产生认同危机。阿尤·乌塔米于2001年推出《萨曼》姊妹篇《拉戎》（*Larung*, 2001），赤道文学奖（Kusala Sastra Khatulistiwa）⁵于当年设立后《拉戎》即获该奖提名但最终不敌古纳万的《全诗集（1961-2001）》（*Sajak-sajak Lengkap, 1961-2001*, 2001）。小说《拉戎》中参与反对苏哈托政权的社会运动分子拉戎与三名参与学生运动的青年一同踏上逃往新加坡的船只，在船上他们就印尼的发展道路产生争论：一位大学生认为社会主义道路不适合印尼国情；另一位大学生厌恶资本主义经济憎恨垄断企业；而1965年苏哈托“反共清洗”曾给年幼的拉戎留下心

¹ 1950年印尼共产党为提振革命士气创办“人民文协”（Lekra）同时发布《成立宣言》，系统阐明革命文艺的方针与路线。1963年以耶辛（H.B.Yasin）为代表的坚持“普遍性”文艺的作家发表《文化宣言》（Manifesto Kebudayaan），将矛头对准人民文协，反对文艺路线的政治倾向性，印尼文坛形成两种相互斗争的文艺路线。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人民文协遭到取缔，两种文艺路线斗争的情形不复存在。详见北京大学梁立基教授撰写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

² 古纳万此后进行一系列努力尝试恢复《时代》周刊，他不仅支持阿尤·乌塔米等独立记者组建的“独立记者联盟”（AJI，随后也遭到取缔），还与同事们创立“信息流研究院”（ISAI）以记录苏哈托政权对新闻界的暴政。苏哈托下台后，《时代》杂志得以重启，古纳万在雅加达乌丹·卡尤街（Jalan Utan Kayu）创办的多个倡导言论自由的社团因此合并称为“乌丹·卡尤剧院”（Teater Utan Kayu）并开展文艺活动活跃至今，阿尤·乌塔米亦属该社团成员。详见维基百科印尼语版：https://id.wikipedia.org/wiki/Goenawan_Mohamad。

³ 普拉姆迪亚是印尼杰出现实主义作家，曾加入人民文协，在苏哈托执政后即被捕入狱，而他在狱中坚持创作的“布鲁岛四部曲”（*Tetralogi Buru*）被认为“不比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逊色”，却在“新秩序”时期被宣布为禁书，苏哈托统治下严苛的文艺氛围可见一斑。详见北京大学梁立基教授撰写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

⁴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在这本书中被极力推崇，被古纳万称作他的“思想之神”。德里达是法国哲学家，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⁵ 印尼赤道文学奖（Kusala Sastra Khatulistiwa, KSK）由印尼文学家、演员理查德·欧（Richard Oh）和时任塞拉扬体育馆总裁一木武（Takeshi Ichiki）于2001年共同设立。该奖项起初采用英文名Khatulistiwa Literary Award，2014年改为现名。赤道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获奖作品为近一年时间内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或小说，由评委会经过严格评审后得出结果。详见印尼作家网：<https://idwriters.com/awards/kusala-sastra-khatulistiwa/>。

理“梦魇”⁶，他因此对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以为然。印尼共产党（PKI，印尼共）伴随着印尼民族意识觉醒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60年代初期依靠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支持发展至鼎盛期，1965年“九·三零”事件爆发后印尼共遭全面封禁，逼迫苏加诺交出总统权力的苏哈托随后全面倒向西方阵营（高艳杰、王世圆，2017）。

2004年印尼第一次举行全国大选，印尼诞生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民主党领导人苏西洛。政治上的改革道路与文学对威权话语的解构并行不悖。2004年获得印尼赤道文学奖的小说《黄昏国度》（*Negeri Senja*, 2003）充满对苏哈托时代威权象征符号的批判性隐喻。《黄昏国度》里的国家并不真实存在，它永远处在黄昏时分，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盲女人残酷地管控知识传播与自由言论，她的特种部队与秘密侍卫能够轻而易举地消灭所有反对者。臣民不敢谈论反对者，为了躲避盲女人的读心术甚至生活在黑暗里。这种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解构性隐喻出自印尼新生代作家塞诺·古米拉·阿吉达玛（Seno Gumira Ajidarma, 1958—）之手。塞诺1958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其父亲是印尼卡渣·玛达大学（UGM）教授，早年曾在雅加达文艺学院（IKJ）学习。曾在“新秩序”末期为印尼文艺界带来文学启蒙意识的口号“新闻被封禁，文学应发声”实际上出自于塞诺的杂文集《新闻被封禁，文学应发声》（*Ketika Jurnalisme Dibungkam, Sastra Harus Bicara*, 1997），1994年塞诺还出版了一部记录印尼国民军入侵东帝汶暴行的文集《眼见为实》（*Saksi Mata*）。

如前文所述，与时代呼应的不止于男性作家。毕业于印尼大学（UI）而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琳达·克里斯坦蒂（Linda Christanty, 1970—）在2004年以短篇小说集《玛利亚·宾托的飞马》（*Kuda Terbang Maria Pinto*, 2004）突出重围获赤道文学奖。小说集虽然是虚构作品，但是深刻地反映“新秩序”时期的社会现实。短篇小说《晚餐》（*Makan Malam*）和《最后的宴会》（*Pesta Terakhir*）都描述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的个体选择与宦海浮沉：或是张皇出逃莫斯科，或是依靠出卖同党换取新政权的高官厚禄，或是在无辜囚禁数十年后无法生活。琳达想要揭示与批判的正是苏哈托政权长期以来为印尼共贴上的错误标签及其为印尼社会带来的创伤回忆。《飞马》（*Kuda Terbang*）、《佐奥》（*Joao*）和《湖》（*Danau*）三篇短篇描绘印尼国民军进入东帝汶时的情形，讲述秘密反抗军事镇压的故事。

重构创伤历史是实现解构威权话语的重要形式，因为文学的重构往往是对主流叙事话语的反拨。新时期的作家们回溯历史、批判现实、对话西方、呼吁改革，其展露出的文学思想顺应新时期的历史潮流，实现对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形塑。

三、突破固有藩篱呼吁平等包容

苏哈托政权在推行反共政策的同时还推行一系列措施压制华人，华人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其文化传统也难以延续。华人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已在印尼出现，1965年以

⁶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Laurie Sears在她的论文中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阐述了1965年“九·三零”事件及其后由苏哈托主导的“反共清洗”在年幼的拉戎心中留下的“梦魇”般回忆，详见论文Reading Ayu Utami: Notes toward a study of trauma and the archive in Indoneisa.

后因反华政策而被禁绝，苏哈托下台后的继任者不断推出措施改善华人境遇（江振鹏、丁丽兴，2012），文化政策解禁后第一部正面展示华人形象的电影《名媛》描绘华人参与印尼民族构建的历史进程，2002年上映后即引发印尼国内外学者关注，电影甚至远赴美国棕榈泉电影节展映。这部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雷米·希拉多（Remy Sylado，1945—）出版于1999年的同名小说《名媛》，讲述原本为印尼土著的风尘女子迪农（Tinung）与华人鸦片商贩陈秉良（Tan Peng Liang）相知相恋相守的爱情故事。跨越族群的婚姻不仅历经坎坷，二人的命运也与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交织交汇。已成名媛的迪农拒绝做日军的慰安妇，潜藏中国澳门的陈秉良决心协助印尼共运输军火进行地下抗日斗争，二人最后双双献身革命。学者Anto Sutandio指出，32年的文化禁锢使得迪农与陈秉良的故事没有脱离革命年代的华人具象，但是它释放了为边缘化群体发声的巨大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雷米·希拉多既是万隆电影学院（ASB）的讲师，又是印尼宗教与神学领域的专家，而小说《名媛》是印尼歌拉梅地亚流行文学出版社（KPG）⁷自1996年成立以来在《萨曼》之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作品，可见“破冰”是后苏哈托时代文学的重要使命，但多元文化仍是其重要背景。

1998年以来华人问题都是印尼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议题，至2004年总统大选时，善待华人已成为梅加瓦蒂与苏西洛等总统候选人的重要主张（黄昆章，2004）。文学中的华人形象逐渐走出革命话语下的“定型”，全球化浪潮下的新型华人形象开始出现。具有美国、新加坡等国留学工作经历的青年女作家菲拉·芭苏姬（Fira Basuki，1972—）的小说《罗杂》（*Rojak*，2004）讲述新加坡华裔女孩贾妮思（Janice）与日惹男孩的跨国婚姻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在婚姻仪式、育孩理念、妇女的家庭地位问题上，贾妮思与婆婆都有不同看法。此外，贾妮思笃信的传统“风水”也与婆婆的爪哇运势说产生矛盾，嫁入爪哇豪门后的贾妮思还要皈依伊斯兰教。⁸实际上这不是菲拉·芭苏姬第一次书写家庭故事，她从2001年开始出版的家庭三部曲“窗门檐”系列（*Jendela-Pintu-Atap*）同样是复合背景下的家庭叙事，小说《窗》（*Jendela-Jendela*，2001）描绘的是一位新加坡籍的藏族男孩与一位爪哇女孩的美好家庭生活。菲拉·芭苏姬并没有直接展现印尼华人的生存状态，而是利用自己的经历与背景将新加坡华人放入印尼文学框架内，在展现新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也将华人问题、文化冲突、宗教包容等命题引入公众视野。

善待华人既是打破族群藩篱的政治议题，也应当是宗教包容的一项子命题，而宗教包容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张。苏哈托政权将宗教信仰限制在五大正统宗教内，公民必须在五种宗教中作出选择。1998年以后狭隘的宗教观得以改善，⁹反思信仰垄断的思潮开始涌现。小说《萨曼》中神父萨曼看着自己带领村民脱贫的田地和村

⁷ 歌拉梅地亚流行文学出版社（KPG）由印尼最大的出版集团罗盘报歌拉梅地亚集团（Kompas Gramedia）创设于1996年，旨在将商业与出版相结合，提升印尼社会的思想开放性。

⁸ 小说名“罗杂”（*rojak*）本是新加坡地道的餐前小吃，是由蔬菜、水果和酱料混合制成的杂烩，在这里指代的正是海岛东南亚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国、跨文化婚姻。

⁹ 苏加诺时期印尼官方承认六大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天主教、新教和儒教。1979年苏哈托总统禁止印尼公民信仰儒教，2000年瓦希德总统恢复儒教为合法宗教。

庄在垄断公司和腐败官僚的联合碾压下付之一炬，他叩问“上帝似乎并不存在”，转身投入社会民主运动之中。此后，阿尤·乌塔米又在《数字“Fu”》（*Bilangan Fu*, 2008）中批判“一神论”思想在印尼形成的信仰垄断，她声称注重功利主义的“现代性”、形成信仰垄断的“一神论”与造成腐败盛行的军人政治是印尼社会的三大敌人。欧卡·鲁思米妮（Oka Rusmini, 1967—）的小说《大地之舞》（*Tarian Bumi*, 2000）描绘巴厘社会跨越种姓的艰难婚姻，小说《椰壳》（*Tempurung*, 2010）则将古老的印度教等级约束比作钳制在现代女性身上的坚硬“椰壳”。塞诺的小说《无言经》（*Kitab Omong-Kosong*, 2004）重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质疑他者赋予的“命数”对渺小个体的约束。在诗歌方面，诗人佐科·皮努尔波（Joko Pinurbo, 1962—）的诗集《我的爱人》（*Kekasihku*, 2005）以一首《母亲的裤子》（*Celana Ibu*）“戏说”圣母与被钉在十字架上“不穿裤子的耶稣”¹⁰。《数字“Fu”》、《无言经》与《我的爱人》都是赤道文学奖获奖作品，《大地之舞》曾获得印尼文教部的一个文学奖项，《椰壳》则摘下2012年的东盟文学奖（S.E.A. Write Award）¹¹。新时期的文学肩负起打破既定的秩序与规则的重要任务，而文学奖项又成为反映文学思潮的重要风向标。

或许是受到2001年以来美国反恐行动的影响，原教旨极端主义也成为印尼文学批判的靶点。小说《真主，请允我为娼》（*Tuhan, Izinkan Aku Menjadi Pelacur*, 2003）自出版以来流行一时但也招致非议，它讲述一名原本信仰虔诚的穆斯林女性因加入伊斯兰激进组织而失望最终走向堕落沦为妓女的故事，反映印尼在世俗极端与宗教极端之间的矛盾与挣扎，宗教世俗化亦成为新时期作家们的重要诉求。而走向极端的女性在新时期印尼文学中绝非偶然，《拉戎》中的女主角之一莱拉（Laila）因爱上有妇之夫而始终不得直至最后与身在纽约热爱爪哇舞蹈而又个性自由的好友塔拉（Tala）碰撞出同性情谊。

虽然阿尤·乌塔米等人都不承认“芬芳文学”的标签，但它却确实已成为包容思想的例证与实现形式。2001年，“芬芳文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德薇·莱斯达莉（Dewi Lestari, 1976—）推出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超级新星1：骑士、公主和流星》（*Supernova 1: Kesatria, Putri dan Bintang Jatuh*, 2001），书中充满科学幻想与诡异谜题，但主线故事不过是平凡的家庭主妇迷上“霸道总裁”而出轨最终又回归家庭。小说受到狂热追捧后还被拍成电影，德薇此后又推出两部续篇：《超级新星：根》（*Akar*, 2002）和《超级新星：雷电》（*Petir*, 2004），两部均获得赤道文学奖的提名。德薇出生于印尼天主教家庭，其大学也在万隆天主教大学（UKP）就读。她常常在小说中表达宗教观念，但她又曾公开表示想对宗教说“不”，她声称“精神主义”才是她的驱动力。同时，德薇还是女子组合“RSD”三人成员中的一员，在“超级新星”系列爆红前，她的音乐远比她的文学作品有名。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女歌手成长为

¹⁰ 母亲的裤子（笔者自译）/玛利亚伤心欲绝/因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十字架上死去/没有穿裤子，仅包裹着一件破袍子/上面还沾着血迹//三天后耶稣从死亡中醒来/玛利亚也早早赶来/带着裤子来到她孩子的坟墓旁/她让耶稣试穿/她亲手缝织的裤子//“合身吗？”玛利亚问/“挺合身的，母亲，”耶稣愉快地回答。

¹¹ 东盟文学奖（S.E.A. Write Award）由泰国王室自1979年以来举办，旨在奖励东盟国家的作家和诗人，每年由东盟十国的政府各自选出一位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前往泰国曼谷参加颁奖典礼。详见印尼文教部语言文学发展中心官网：<https://rumahpusbin.kemdikbud.go.id/penghargaan/penghargaan8.php>。

一名流行小说家，德薇的女性书写经历本身就具有突破性意义，其展现出的宗教包容观念也具有时代价值。

紧跟现代化的步伐使得新时期女性书写大放异彩，但印尼仍然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世俗国家，其穆斯林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7%（见印尼中央统计局Badan Pusat Statistik），因此女性写作可谓是宗教世俗化的重要载体，同时温和的穆斯林男性作家也在反思狭隘的宗教观。2004年，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的青年作家哈比布拉曼·埃尔·西拉茨（Habiburrahman El Shirazy, 1976—）创作的小说《爱的诗篇》（*Ayat Ayat Cinta*, 2004）一经出版即受到狂热追捧，甚至引发一批穆斯林作家争相模仿，一时间以“爱”为主题的伊斯兰“罗曼”小说纷纷出版发行，而《爱的诗篇》于2008年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与小说一道双双红遍马来群岛地区。小说与电影中一段经典场面是主人公法赫里（Fahri）在地铁上与他人辩论否认伊斯兰狭隘性的情节，他在众人的目光下口若悬河地引用包容与爱的经文诗篇不仅为他吸引住了未来的人生伴侣艾莎（Aisha），也成为电影与小说被各方介绍的一幅代表性画面。此后哈比布拉曼又推出《爱的诗篇2》（*Ayat-Ayat Cinta 2*, 2015），将伊斯兰“罗曼故事”的背景设定在物欲横流的欧洲都市，青年穆斯林的自由爱情穿梭在巴黎、伦敦等地，这应当看作全球化背景下印尼文学中西方想象的一个缩影。

四、对话西方想象展望美好未来

21世纪之初，科技的飞速发展让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在印尼，随着民主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印尼文艺界对“西方”的认知与定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初期的“妖魔化”逐渐向“理想化”滑进。《萨曼》中的女性“述奇”可以体现印尼文艺起初对西方的错位想象：莱拉看见纽约的地铁呼啸而过觉得如同猛兽，她不相信在纽约这座国际都市女性的性自由似乎被所有人都接受；塔拉遇到在爪哇的港口登陆的白人，觉得他们高大威猛金发碧眼如同怪兽，质问他们“为何要觊觎这片群岛上的香料”。

实际上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的印尼女作家恩哈·迪尼（Nh. Dini, 1936—2018）早在阿尤·乌塔米等人之前就已对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印尼女性认知有着深刻的描摹。迪尼的女性书写大多来自她嫁给一位法国外交官后在日本、法国和美国等国的生活经历。在2003年的东盟文学奖获奖作品《宽子的国籍是日本》（*Jepun Negerinya Hiroko*, 2000）中，迪尼讲述她与外交官丈夫耶夫斯（Yves）在日本结婚定居的生活：与外交官结婚需要经过领事馆、大使馆的层层盘问，“像是在面试一份工作”；耶夫斯婚后脾气暴躁，常引得保姆辞职，而迪尼却能够全面地兼顾家庭内外事务。这部小说出版时，迪尼已与她的丈夫离婚并返回爪哇三宝垄生活多年。除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体意识的言说，小说更带有与想象中的西方进行对话的尝试，而文学与现实的互相引证让西方想象朝着“理想化”滑进。小说《德莉莎的祷读》（*Hafalan Shalat Delisa*, 2005）讲述女主人公德莉莎（Delisa）一家经历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故事，虔诚的信仰让她获得在洪水中“漂浮”的力量，然而最后拯救她的是一位美国救援队的战士。“西方想象”褪去“魔鬼”的外衣，有了“拯救者”的光芒。文学以修复现实为己任，灾难叙事激活西方想象的理想之光。但落下残疾的德莉莎放弃美国战士的收养选择留在印

尼，她巡回演讲信仰的力量抚慰海啸过后芸芸众生的心理创伤。回归传统的文学性具有与西方想象平等对话的自信力量。

“理想化”的西方想象还会解救教育落后的现实困窘。安德烈亚·伊拉达（Andrea Hirata，1967—）依据他的人生经历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天虹战队》（*Laskar Pelangi*，2005）讲述贫困学校诞生天才少年的故事，小说凭借五百万册的销量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冠军。此后安德烈亚以每年一部的速度陆续推出了三部续篇：第二部《梦想家》（*Sang Pemimpi*，2006）中天才少年伊高（Ikal）虽然身处条件艰苦的偏远中学却梦想考入法国巴黎的索邦大学；第三部《伊登沙》（*Edensor*，2007）中伊高等人成功实现梦想并已踏上了环游欧洲之旅，他们的梦想甚至是征服欧洲；第四部《玛莉雅美·卡尔波夫》（*Maryamah Karpov*，2008）中伊高完成学业回到家乡勿里洞最终找回自己当初心爱的女孩。《天虹战队》系列有着忠实的拥趸，因为四部小说都被改编为电影上映收获大量观众。历经艰难而求学于欧洲最终又回到家乡找回真爱，这可看作将西方“理想化”而又与之对话的隐喻。

2009年，阿赫迈德·福阿迪（Ahmad Fuadi，1973—）依据自身经历创作小说《五塔之国》（*Negeri 5 Menara*，2009），再次书写“理想化”的西方对印尼教育困境的解救，“走向西方”并与之平等对话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依托。主人公阿里夫（Alif）年幼时在米南加保过着原始的农村生活，因应母亲嘱托前往寄宿制伊斯兰学堂学习。他与五位好友在昏拜时分来临前遥望天边云霞，梦想有朝一日踏上理想中的国度学习。经过刻苦努力，阿里夫最终拿到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奖学金，他的三位好友分别在美国、英国、法国、埃及实现各自理想，而另外两位好友则留在印尼创办更多学堂。成名后，福阿迪继续推出《五塔之国》的续篇《三彩之域》（*Ranah 3 Warna*，2011）和《一口之湾》（*Rantau 1 Muara*，2013），形成“《五塔之国》三部曲”并改编为电影上映。与此同时，福阿迪还与妻子创立“宝塔社团”（Komunitas Menara）帮助家庭困难的儿童摆脱教育困境。教育落后的情形在印尼社会非常严重，2018年包括东盟十国在内的65个国家参与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PISA），印尼排名第63位，《东盟邮报》撰文指出印尼教育的落后实质上是“政治问题”（见Sheith Khidhir）。印尼的青年作家们将“理想化”的西方想象作为解决教育困境的出路之一，踏上欧美大陆的主人公们都尝试用自身文化传统与西方对话，这一叙事模式既对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作出强大回应又维持民族自信，使得文学肩负起为美好未来而创作的使命责任。

五、结语

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文学是民主改革催生的文艺产物，同时又参与改革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构筑与形塑。作为文学流变，解构威权话语应当具有先锋地位。1998年以来涌现的青年作家们以回溯历史批判现实的叙事策略挑战苏哈托时代的话语权威，在民主改革的潮流中显得锋芒毕露。社会包容在民主改革的新时期具有时代价值，民主思想赋予新时期文学打破固有藩篱的话语权威，正统与传统、保守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思想继续在千岛之国碰撞交融。全球化浪潮裹挟西方经济与科技侵袭印尼，印尼社会的“西方想象”逐渐向“理想化”滑进，新时期作家为解决教育困境与社会发

展不平衡问题给出登陆欧美并以自身文化传统与其平等对话的自信答卷。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文学体现新时期作家对社会发展与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怀，是植根印尼民族土壤在共同体视野下与世界浪潮进行对话的叙事革命。

参考文献

- Allen, Pamela 2007. Beyond 'Ecriture Feminine': Desperately seeking a new literary paradigm. *Review of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Affairs*, Vol. 41, No.2: 25-40.
- Aveling, Harry 2007. Indonesia literature after reformasi: The tongues of women. *Kritika Kultura*, Vol.8: 5-34.
- Badan Pusat Statistik Indonesia. Penduduk Menurut Wilayah dan Agama yang Dianut, <https://pkub.kemenag.go.id/files/pkub/file/file/Data/zuqi1368036766.pdf>, 23 October 2010.
- Hatley, Babara 1999. New directions in Indonesian women's writing? The novel Saman.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23, No.4: 449-459.
- Khidhir, Sheith. How Will Indonesia Fare in PISA 2018? The ASEAN Post, <https://theaseanpost.com/article/how-will-indonesia-fare-pisa-2018-0>, 23 August 2018.
- Sears, Laurie 2007. Reading Ayu Utami: Notes toward a study of trauma and the archive in Indonesia. *Indonesia*, Vol. 83: 17-39.
- Sutandio, Anton 2014. Ca Bau Kan: The problematic centralizing of the marginalized. *Jurnal Ilmiah Aurora*, Vol.1, No.4: 263-274.
- Zariat Abdul Rani, Mohd. 2012. Islam, romance and popular taste in Indonesia.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Vol. 40, No.116: 59-73.
- 范若兰, 2017, 〈印尼民主转型时期的妇女权利之争与性别主流化〉, 《东南亚研究》, 第2期, 页48-60。
- 高艳杰、王世圆, 2017,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兴衰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第4期, 页67-75。
- 黄昆章, 〈善待华人, 继续改善华人境遇〉, 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o/2004-07-07/05383009739s.shtml>, 2004年7月7日。
- 江振鹏、丁丽兴, 2012, 〈嬗变中的“他者”形象: 论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当地社会华族观〉, 《东南亚研究》, 第6期, 页78-85。
- 梁立基, 2014, 《印度尼西亚文学史》,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唐慧, 2015, 《印度尼西亚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许利平, 2011, 〈印度尼西亚的多元民主改革及前景〉, 《南洋问题研究》, 第1期, 页1-9。
- 周启宇, 2018a, 〈印尼女作家阿尤·乌塔米笔下的历史与现实〉, 《当代外国文学》, 第1期, 页71-78。
- 周启宇, 2018b, 《印尼女作家阿尤·乌塔米小说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洛阳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